

刘增杰

主编

中國解放區文學史



中国解放区文学史

刘增杰 赵 明 王文金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解放区文学史

主 编 刘增杰

责任编辑 金 波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125 插页：4 字数：276 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3.00元

ISBN 7-81018-114-9/I·14

目 录

期待着深化的研究领域 (代前言)

——解放区文学研究断想…………… (1)

文学运动篇

第一章 从苏区文学到解放区文学…………… (17)

第二章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和解放区文学的
诞生与发展…………… (26)

一 蓬勃发展中的文学社团…………… (26)

二 毛泽东等人的文学主张…………… (30)

三 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33)

四 晋察冀边区关于三民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 (38)

五 理论探讨与文学论争…………… (43)

六 创作新貌…………… (51)

第三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
与文艺整风运动的开展…………… (58)

一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58)

二 《讲话》的基本内容与历史意义…………… (61)

三 《讲话》指引下的文艺整风运动…………… (63)

四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 (68)

五 群众性文艺活动的开展与作家创作的新变化…………… (73)

第四章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的文学批判
与文学论争…………… (75)

一 对王实味文艺观的批判…………… (75)

二	关于“演大戏”问题的讨论·····	(80)
三	晋察冀边区对“艺术至上主义倾向”的批判···	(87)
四	对《腊月二十一》的批评·····	(89)
五	晋绥文艺界讨论《丽萍的烦恼》·····	(92)
六	围绕《叹息三章》的争论·····	(95)
七	《纺车的力量》引起的风波·····	(100)
第五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文学发展的 新形势·····	(104)
一	文学发展的新形势·····	(104)
二	活跃的张家口文学运动·····	(106)
三	蓬勃发展的东北解放区文学运动·····	(109)
四	晋冀鲁豫解放区关于“赵树理方向”的讨论···	(114)
五	对萧军的批判·····	(116)
六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与出版·····	(118)
七	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解放区文学 运动的初步总结·····	(121)

文学创作篇

第六章	成长中的短篇小说·····	(131)
一	发展轨迹·····	(131)
二	丁玲的社会剖析小说·····	(141)
三	赵树理与解放区的大众化小说·····	(147)
四	孙犁的抒情小说及其他·····	(158)
五	刘白羽的新闻体小说和其他描写战士生活 的小说·····	(168)
第七章	中、长篇小说的丰收·····	(172)
一	由短篇小说向中、长篇小说发展的必然趋势···	(172)
二	异军突起的抗日英雄传奇·····	(173)

三	抗日战争时期农村变革的艺术再现·····	(185)
四	描写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画卷·····	(201)
五	反映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	(216)
第八章	活跃的诗歌创作·····	(220)
一	诗歌发展概况·····	(220)
二	艾青、何其芳等诗风的新变化·····	(229)
三	解放区的“七月诗派”·····	(237)
四	创作民歌体新诗的诗人队列·····	(240)
五	晋察冀诗人群·····	(249)
第九章	多样的戏剧创作·····	(258)
一	抗战初期的街头剧运动与农村戏剧运动·····	(258)
二	从秧歌剧到新歌剧·····	(266)
三	旧剧改革·····	(281)
四	话剧创作·····	(292)
第十章	报告文学、散文与杂文创作·····	(303)
一	硕果累累的报告文学·····	(303)
二	散文与杂文创作·····	(320)
附录	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文学运动·····	(331)
	——中国工农兵文学运动史提纲	
后记	·····	(345)

期待着深化的研究领域

——解放区文学研究断想

(代前言)

时代的选择：民族意识的呼唤

历史将永远为1937年铭刻丰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大举进攻，激怒了我国各阶级、各阶层抱有不同信仰的人们。抵抗侵略、一致对外的民族呼喊声，摇醒了沉睡的中华大地，震撼着整个民族的心：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发出庄严号召：“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在全国抗日怒潮的推动下，打了10年反共内战的蒋介石，也在庐山发表演说，要求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解放区文学^①就诞生于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诞生于这血与火交织的时代。

时代决定了解放区文学必然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保持着血肉联系。任何抵御外族侵略的民族，都无一例外地、无意识或自觉地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中汲取重振民族精神的活力。为了救亡图存，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成了人民反抗凶恶敌人的强大精神支

① 解放区文学包括抗日根据地文学和解放战争时期文学两个部分。为了行文方便，在论述抗日根据地文学时，我们仍使用了“解放区文学”这一概念。

柱。抗战初期，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历史，用赞美本民族历史的辉煌来提高民族自信力，向浴血奋战中的军民灌注民族生气。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代表，曾以隆重的礼仪，派高级官员赴陕西省中部县举行公祭黄帝陵典礼，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祭文，慷慨激昂，张扬民族正气，吁请炎黄子孙，认清当时的严峻形势：“寇患愈深，日蹙百里，何以止之，全民奋起”^①。

蒙古文化研究促进会也随之在延安成立。人们向武功显赫的成吉思汗表达敬意，用以激励新的抗日英雄，再展中华民族的雄风英姿。

祖国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都成了作家艺术家的赞美对象。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成了千古绝唱，拨动了亿万爱国者的心弦；黑山白水，巍巍太行，在诗人的笔下，成了中华民族不屈意志的象征；连普通的古石器，此时也闪出了圣洁的光辉，艾青的《古石器吟》，是对抗敌精神的礼赞，他呼唤人们尊敬古石器“一如尊敬我们的祖先”，牢记“我们祖先创业的艰辛，战斗的光荣”。^②

历史上爱国主义的诗人，抵抗侵略者的将领，在抗战时期受到了格外的推崇：延安新诗歌会专门举行了颂扬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座谈会；延安名流称颂杜甫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有骨头的人，建议在陕甘宁边区为他建立坚固的纪念碑；延安平剧研究院赶排《岳飞》；人们争看中国女子大学演出的三幕话剧《秋瑾》；以被誉为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命名的学校、图书馆，哺育了成千上万的抗日战士。

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滋生发展的，并随着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而日见繁荣。

① 转引自《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② 1941年9月17日《解放日报》。

关注历史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在刚刚获得了解放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人们日益深刻地感受到：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群众，特别是农民，是进行这场反侵略战争的中坚力量。毛泽东对此作过精辟的概括：“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①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家的创作，把注意力放到了农民身上，把满足作品的主要接受对象——农民的精神需要，看作自己崇高的历史使命。作品的风格、形式、语言、题材、审美情趣，无一不受审美对象的制约。

战争环境下民族意识的高涨所导致的向传统文化的回归，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要接受对象的客观现实，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于根据地文学运动的坚强领导，构成了在这一特定时空下文学的独特个性和色调。

就总体而言，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文学的独特品格，主要表现在：

一、高昂的文学主旋律。从抗战的指挥中心延安到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回荡着的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庄严呼唤：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粗犷的怒吼，雄壮格调，高奏着激情澎湃的爱国主义的主旋律。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正与当时这种战斗的生活同调。它以向上的、进取的战斗豪情，讴歌胜利，号召人们在屈辱中奋起，在血与火的搏斗中换来祖国的新生。在生死存亡的决战时刻，决不允许后退和犹豫。诗人写下的战斗箴言是：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

“看，

这是隶奴！”①

在这种昂扬的主旋律下，歌唱个人，被视为羞耻；吟唱风雪花草，已变得完全不合时宜。这种在太平年代人们不可思议的现象，却是当时根据地作家共同的心曲。时过境迁，人们也许会责备作家的偏激和固执，惋惜创作色调的单一，但当时根据地的作家顾不了这些，他们唯一的信念是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尽到责任。他们甚至不愿以文学为唯一职业，他们从事着各式各样的抗日的实际工作，怀着一种自豪的崇高感向人们宣布：自己首先是一名抗日战士！据资料记载，1938年以前，延安上演的40多个剧目，几乎全部与抗战有关。

这当然不是说，抗日战争是八年抗战中根据地创作的唯一主题。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初步解放的根据地农民，只有从思想上挣脱封建思想的枷锁，告别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才能真正发挥出排山倒海的抗日伟力，根据地作家创作的为数可观的反封建作品，构成了文学主旋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对于英雄的渴望。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鲜明特色之一，是许多作家表现对于塑造抗日英雄形象的热情。民族意识的强化，现实生活中叱咤风云的抗日英雄创造的感人业绩，激励作家创造出了许多个性各异，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典型。丁玲、周立波、刘白羽歌颂八路军抗日将领的报告文学作品开其端，继之在小说创作方面，又涌现了一批深受读者欢迎的抗日英雄传奇。《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以及解放战争

① 田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我的短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时期出版的《新儿女英雄传》就是其中的代表。连并非以描写抗日战争为其内容的《小二黑结婚》，其中也特别点出：小二黑是在反“扫荡”中打死过两个敌人的特等射手。西德汉斯·罗伯特·尧斯在《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中说：“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进行鉴定的标准，显然是这部作品在其问世的历史时刻用以满足、超出、辜负或者背离其第一批读者的期望的方式方法所提供的。”歌颂抗日英雄的作品，作为一种信息输出，由于与当时作品接受对象的思想情绪，认识水平，接受能力，思维轨迹相适应，因而受到了根据地读者的热烈欢迎，即信息输出后得到的反馈，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它的美学价值，证明了它对第一批读者期望的满足。这无疑直接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心理，鼓励他们在描写英雄人物形象方面，继续进行不懈的努力。作家的这一创作心态，在描写根据地日常生活、表现普通人物的作品中，也有着或明或暗的流露。和抗战以前描写农民题材的作品相比，根据地作家在选取素材时，更多地关注着农民的生命力，创造力，表现出敌人制造的苦难以泯灭掉农民的美质，他们质朴而又坚韧，身上蕴含着中华民族再生的巨大潜力。一些成功作品对这些普通农民形象的描写，同样渗透着一种深沉的英雄气息。

三、文学形式的变革。在向传统文学汲取精神力量的同时，传统文学形式在根据地也受到了重视，章回体形式的采用就是一例。五四以来，我国的新文学工作者多已不再采用这种形式进行创作。根据地作家适应农民读者群的欣赏习惯，利用章回体形式所创作的中、长篇小说，以其段落整齐、故事完整、情节曲折的特点而深受欢迎。对农民审美情趣的尊重，导致了民间艺术形式的新生。流行民间的秧歌小调，经过艺术的再创造，化为反映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的秧歌剧，民歌的搜集整理与对民间艺人的帮助扶植蔚为风气，吸取民歌营养创作的长篇叙事诗使人耳目一

① 德文版《接受美学：理论与实践》，威廉·芬克出版社1979年版。

新。根据地文学在文学形式方面的另一个特点是作品的小型化。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需要作家及时地反映，动荡不定的生活环境也使作家无暇潜心于宏篇结构的制作。这就使短诗、独幕剧、报告文学等文学样式的作品，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有了长足的发展。小型化和通俗化、群众化是紧密相连的，对于识字不多或还是文盲的农民和士兵，短小精悍的独幕剧、街头剧、街头诗、枪杆诗、墙头小说等通俗作品，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文学形式的变革使根据地文学在动员群众投入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过程中，产生过极大的号召力和民族凝聚力，较充分地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形式变革的匆促，也给根据地文学创作带来了缺乏深刻的思想意蕴和艺术上较为粗糙的缺陷。

四、嬗变中的文学观念。抗日民族战争改变着我国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结构，调整着整个文化的走向，制约着文学的发展。上述文学时代旋律的变化、人物塑造的创新、文学形式的沿革，都和文学观念的更新紧紧相连。新民主主义文学观的诞生，文艺工农兵方向理论体系的确立，文艺为政治服务观点的强化，文艺与群众结合口号的提出，文艺创作“写光明”主张的强调，等等，这些新的文学观念，对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规范，宣告了中国工农兵文学运动独特体系的诞生。

总之，抗日战争呼唤着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渗透着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民族意识，是根据地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根据地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意识，有时以赤裸裸的形式直接表现了出来，有时则以非意识的形式，通过作家的思维意念、感情构造和语言结构表现了出来。只有深刻认识这一特定时代，洞悉根据地文学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体察根据地这一新的天地在急风暴雨中的历史性的变革，才会充分理解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独特的历史价值。

在解放战争时期，描写民族斗争仍然是解放区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文学的阶级意识逐渐强化。描写土地改革运动作品的问世，就是文学发生变化的一个明显标志。但整个来说，由于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的直接发展，所以，这两个时期的文学，从文学的内容到文学的形式，从文学风格到文学语言，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因此，这里对解放战争时期文学的发展特征，不再展开具体论述。

研究现状的反思与研究领域的拓展

解放区文学的研究工作，经历了一个人所共知的由热烈到冷落的发展过程。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后，在全国解放的欢乐气氛中，解放区作品大量出版；对解放区作家的研究工作，也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进行。此后，随着解放区变为一种历史存在，而人们对于现实的关注总是要超过对于历史的怀念，使解放区文学的研究工作也回到了应有的较为恰当的位置。粉碎“四人帮”后，虽有少数同志在从事解放区文学的研究工作，编选作品，出版刊物，整理资料，撰写论文，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总地来说，解放区文学的研究工作，仍然显得相当的冷落与沉寂。青年读者对于解放区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淡漠，多数解放区文学的研究论文，发表后也很难引起读者的广泛注意。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实。揭示构成这一现实的诸多层面和因素不是本文的任务。单从解放区文学研究本身看，冷落局面的形成，不能说和读者对于研究现状的不甚满意没有关系。应该说，研究中对解放区文学不适当地贬抑和一味颂扬这两种极端的倾向，它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部分读者对解放区文学的漠不关心。解放初期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人所公认的，但研究工作

中的缺陷也是有目共睹的。某些研究论文不是根据创作实际引出新的结论，而是根据既定的理论，从创作上寻找例证。创作实践的全部丰富性，被抽象地概括在几条千人一腔的既定模式里。这当然会损害读者对解放区文学的信任感、崇敬感。在新时期的研究工作中，上述两种倾向仍是研究工作继续深化的严重障碍。

对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脱离实际的一味肯定，使一些研究论文失去了深沉的历史意识。对那场历时八年血与火斗争年代的崇敬，有时可能会使研究者把对历史的怀念混同于冷静的文学批评。出于继承、捍卫革命文学传统的良好愿望，而把在当时战争环境下实行的政策和作法拿来范围新时期文学，或把适应当时读者层次审美需要的作品用来作为指导今天创作的标杆，其消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相反，某些论文中所流露的对整个解放区文学不值一哂的轻率态度，也是极为有害的。不体察国情，生吞活剥地用某种文学框架来硬套丰富的文学现象，从而得出耸人听闻的断语，也很难进入研究的堂奥。认真地说，由前辈作家和无数业余作者用生命和鲜血创造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不容否认的不足之处，但它仍不失其丰富多彩，是一种较为鲜活独特的文学多元形态，只是由于时代以及人们认识上的限制，某些文学风格的作品，才未能得到充分发展。这是在研究解放区作品过程中始终应该把握的基本问题之一。如果轻视解放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积累，没有进行艰苦的大量的阅读和思索，只凭印象任意发挥，则所得出的结论必然会和文学发展的实际相去甚远。

这两种倾向，都未能充分考虑解放区文学所处的特定的时空，是用个人的好恶，个人的情绪、感情，个人的审美志趣，代替了科学的文学批评。客观地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批评倾向，其评价标准，却又很可能是来自同一的批评模式。即他们都仍着眼于政治，前者是因为根据地文学在服务于抗战方面的巨大作用

而将其看得完美无缺，后者则认为根据地文学和政治贴得过紧，惋惜文学本身失去太多而对其产生冷漠之情。这种把文学功能单一化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当然无法从对当时文学现象的认识中，导出符合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结论。

改变目前的研究格局、深化研究工作，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在于增强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如果研究者在精神上处于充分自由状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以微观研究作基础，进一步延伸眼光，更多地重视全景研究，将会为开拓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提供真正的机会。

研究工作的深化，当然包含着对研究对象与研究成果新的审视。已往的研究工作，由于研究者所受时代条件的限制，以及某些非批评因素的干预，研究工作所做出的结论并非都是稳妥谨慎的，需要我们在尽可能详细的占有材料的基础上，重新做出科学的结论。在这方面，少数研究者已经进行过一些带有开拓意义的工作。严家炎力排众议，根据自己对《生活报》与《文化报》争论材料的考察与辨析，对“萧军思想批判”问题得出了新的结论，从而使原有结论在事实面前发生了动摇。这项工作当然不是一两个研究者所能完成的。事实上，文学运动和创作评论中的许多问题是值得进一步审视的。以作品评论为例，过去对短篇小说《腊月二十一》的批评，就颇为值得认真研究。《腊月二十一》所要表现的，不是正面揭露日军的暴行，而着意于写出一个游击区普通村长的心态。在当时民族斗争和统一战线内部斗争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这个觉悟并不高的村长却深明大义，在日本侵略军到来之后，巧妙地和敌人虚与周旋，掩护同志，表现了在普通的中国人中间，潜藏着可贵的抗日力量。作品尽管还存在若干缺点，但基调却是健康的。对于这篇作品，当时却批评为“没有站在人民的、民族的立场上”^①，开了动辄用立场问题批评作品的一个先例。

① 周扬：《〈腊月二十一〉的立场问题》，1942年11月8日《解放日报》。

至于在晋绥根据地，把对小说《丽萍的烦恼》的批评，由艺术问题的讨论，迅速地转为对作者的政治评判，说作品的出现“是晋西北学风文风中一股阴风”^①，更是值得重新提起的一桩旧案。批评《丽萍的烦恼》一结束，曾发表《丽萍的烦恼》这篇小说的《西北文艺》就宣告停刊，晋绥地区的文艺创作也顿时更为沉寂。他如关于“演大戏”问题的争论，对“艺术至上主义”的批判，虽然有其各自的背景，但现在看来，原有结论的根据，在事实面前已经显得很不充分了。

研究工作的深化当然不限于对错误结论的纠正，甚至主要工作并不表现在这里。深化意味着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地发现和拓展，意味着不断调整视点和角度，突破研究工作的单一模式，从而带来研究工作的立体感、多样化。在这一领域，至今仍存在着研究工作的巨大空间。

如果我们从作家的艺术个性、从文学流派发展的角度出发，对解放区文学进行新的审视，我们将会发现，不同艺术风格作品有趣的发展轨迹，并由此进而看出时代对文学的深刻影响，以及非文学因素对艺术发展可能带来的限制，从而寻找出符合文学发展内部规律的指导方针。以短篇小说发展为例，源于作家思考的主动精神，解放区还是形成了四个艺术情趣各异的创作群体：先是在40年代初期出现了丁玲独树一帜的社会剖析小说，接着是赵树理的大众化小说异军突起，继之是孙犁的抒情小说脱颖而出，40年代后期又有刘白羽的新闻体小说问世。丁玲、赵树理、孙犁、刘白羽四位短篇小说家及其追随者，大体上构成了四个具有不同艺术个性的小说群体，形成了四峰并立的基本格局。丁玲的短篇小说对残留的旧社会的痼病和弊端决不宽容，以对社会的深刻剖

① 沈毅：《与莫耶同志谈创作思想问题》，1942年7月7日《抗战日报》。

析见长；赵树理则脚踏大地俯瞰人生，以大众化风格为其追求的极致，这是一个在艺术上当时影响最大的小说群体；孙犁的短篇小说诗化了血与火的生活，以其对于美好心灵的呼唤在艺术上闪射异彩；刘白羽则以反映现实的迅速及时取胜，作品中跳跃着人民解放军历史性大进军的时代脉搏。由于战争影响和其他因素的制约，解放区文学虽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但是，在共同的文艺思潮影响下，思想倾向比较接近、艺术上有着大体相同追求的作家群，还是在不断地产生着、发展着。诸如，赵树理及晋绥青年小说作者群，晋察冀诗人群，草叶社、文学月会作者群，《谷雨》作者群等，都闪射出过亮淡不一的光彩。不同艺术个性作家和作家群的发展所经历的曲折变化，给人们提供的研究空间是十分宽阔的。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作品一旦发表，读者总是会带着现实的启发和今天的理解对其进行重新塑造。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审视解放区文学，和一些把解放区文学一律视为“思想浅薄”的观点相反，人们惊喜地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某些作品的现实主义光辉，反而显得更为耀眼。丁玲的短篇小说《夜》，并没有明确地告诉人们作品的主旨，然而今天读来，却使读者有所感悟，感受到了作品所隐约吐露的对于破除农村中封建婚姻罗网的向往。而《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中的黑妮形象，其本身不正是对泛滥中的血统论的挑战么？孙犁短篇小说《嘱咐》中水生嫂勇挑重担的精神境界，实际上表现了农民文化心理结构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抗日战争的烈火荡涤了昔日农村妇女逆来顺受的自卑心理，在水生嫂身上体现了妇女自主意识的张扬。而柳青的《种谷记》，虽因其结构松散读来使人感到沉闷，但细细品味，作品的思想深度还是叫人赞叹不已的。《种谷记》最早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村工作中报表成灾、文牍主义严重这一现实问题。作品所描写的农民讨论民主集中制的一段对话，妙趣横生，在戏谑的背后自